

基于语料库的《庄子》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张伟红



摘要:自19世纪末首次英译以来,《庄子》迄今已有30多个全译、选译、节译和摘译本,其中梅维恒和汪榕培的全译本分别为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西方和中国译本的代表。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分析两译本呈现的译者风格,并进而探讨二者风格差异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两译本形式类参数显示:梅译本难度略大于汪译本;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显示:梅译本语言灵活,注重原文文学色彩的传递,偏重归化策略,汪译本文笔凝重,注重庄子哲学思想的传播,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产生两译本译者风格差异的主要动因在于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及目标读者。

关键词:《庄子》;译者风格;语料库;动因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Translators' Style in *Zhuangzi*

ZHANG Weihong

Abstract: Since its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re are more than 30 complete, selected and abridged English versions of *Zhuangzi*, with Victor Mair's and Wang Rongpei's as tw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1990s. A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is built to analyze their translators'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al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ir's translation is slightly more difficult than Wang's; Mair's version is more flexible, emphasiz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original and adopting mostly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while Wang's is more dignifie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Zhuangzi, and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translators' styles lie in their choic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purpose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argeted readers.

Keywords: *Zhuangzi*; translator's style; corpus; factors

《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重要典籍，现存 33 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记录了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也因其奇幻瑰丽的想象和汪洋肆意的文学特色而广受赞誉，对后世哲学、宗教、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英译始于 1881 年英国人巴尔福翻译的 *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迄今已有 30 多个英文全译、选译、节译和摘译本，其中梅维恒 (Victor Mair) 和汪榕培的全译本分别为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西方和中国译本的代表。梅维恒是知名美国汉学家，对于庄子哲学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1994 年翻译出版《庄子》全译本 *Wondering on the Way :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受到广泛好评，并于 1998 年再版。有学者认为，梅译本在文学性和通俗性方面都超过了华兹生 (Burton Watson) 译本 (包兆会, 2004)。汪榕培是我国著名翻译家，1997 年翻译出版《庄子》，是中国学者的第一个全译本，包括本书在内的 8 部汪先生典籍译著入选《大中华文库》，可见其译文质量之优。

西方世界的《庄子》研究主要聚焦于庄子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 (Mair, 1983), *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 (Allinson, 1989) 等相关论著相继问世，表明“英语世界对《庄子》日益重视以及对《庄子》研究的自觉化和多元化”(包兆会, 2004)。国内学界《庄子》研究则视角多样，除哲学思想、文学特色研究外，《庄子》翻译研究也颇受关注。张伟红 (2020) 将国内《庄子》英译研究划分为综合性研究、英译版本历时研究、译者和译本研究、核心术语及特殊词汇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四大类，如徐来 (2008)、姜莉 (2014)、赵彦春和吴浩浩 (2017)、朱舒然 (2019)、殷燕 (2021) 等。然而，相较于《庄子》在中国哲学和文学史上的作用，其英译研究整体略显薄弱。在译者和译本研究中，知网统计数据显示，汪榕培、理雅各和华兹生的《庄子》翻译研究位列前三，如林琳和周桂君 (2021) 通过理雅各和汪榕培译本对比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意向性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表征问题；仇轶凡和李秀英 (2021) 分析了汪译《庄子》对实用成语的跨时空语境重构的策略及特点。专文对比研究《庄子》汪译和梅译只有一篇，庄少霜 (2016) 借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研究了两译本概念隐喻翻译策略的差异，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译者思维模式不同。

在已有的《庄子》译本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凭借文本中的个别例证，得出感悟式的结论，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几乎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分别代表中外高质量译本的《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为语料，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拟从形式类参数和特殊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入手，通过研究：《庄子》两译本的形式类参数呈现何种译者风格、语言类参数呈现何种译者风格、二者风格相同或差异的主要动因是什么三个主要问题，为《庄子》英译研究从方法论及中外译者风格对比等方面提供借鉴。

1. 语料库翻译学与译者风格

20 世纪 60 年代，语料库方法与语言学的结合为人文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学者 Mona Baker (1993) 首次提出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用于翻译研究，

开辟了语料库翻译学的新领域。“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研究上的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本质的一种翻译学研究方法。”(王克非,2012)⁴相较于传统译学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通过量化数据直观呈现研究结果,研究更加客观确切,结论更具说服力。

译者风格研究一直是传统翻译研究的重要关注点。Baker(2000)将译者风格界定为一种“指纹”。胡开宝和谢丽欣(2017)认为译者风格(译者的翻译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应用等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2000年,Baker(2000)利用TEC(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翻译语料库研究Peter Bush和Peter Clark的不同译本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子长度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转述动词“say”不同形式出现的规律,描述了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从而开创了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此后,国内外学界也采用类似方法进行译者风格研究,极大地扩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如Bosseaux(2001,2006)、Olohan(2004)、冯庆华(2008)、刘泽权和闫继苗(2010)、范敏(2017)、侯羽和郭玉莹(2021)等。Saldanha(2011)认为,译者风格研究可分为“源文本型译者风格”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即黄立波和朱志瑜(2012)所提出的S型和T型译者风格研究,“前者主要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文本中表现原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而后者主要关注译者特有的表达方式。”(侯羽等,2021)本文研究视角为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

2. 研究方法

无论源语型还是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都主要体现在非语言特征和语言特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译本选择、翻译方法和策略、序、注等副文本信息;后者可细分为形式类参数、叙事类参数、语言类参数和其他综合类参数(黄立波,2018)。鉴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庄子》两译本中的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及其翻译策略。

形式类参数是指通过语料库索引软件直接可以呈现的或者通过简单计算就能得出的数据,此类参数“都是译者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其特征在一定时期内应当是稳定的”(黄立波,2018)。

我们首先创建《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的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并为两个译本进行TreeTagger词性赋码,然后使用WordSmith 8.0软件自动获得两个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并计算出6字母以上词汇占比和词汇密度,同时利用BFSU-HugeMind Readability Analyzer 2.0软件自动获取其易读性(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数据,如表1所示。

表 1 《庄子》梅维恒和汪榕培译本形式类参数

形式类参数	梅译本	汪译本
标准类符/形符比	40.00	38.45
平均词长	4.43	4.30
6字母以上词汇占比(%)	27.06	24.55
平均句长	17.40	16.79
词汇密度(%)	56.06	56.65
易读性(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	66.04	67.15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形式类参数

类符/形符比是指某一文本中所使用的不同词语的数量与词语总数量与之间的比值。通常会以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STTR) 作为衡量标准, 比值越大, 说明词汇多样性程度相对越大, 难度也相对越大。本研究中《庄子》梅译本的 STTR 值为 40, 略大于汪译本的 38.45, 说明前者的词汇丰富度略高, 难度略大。

平均词长是指某一文本中所使用词语的平均长度, 本研究中梅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4.43, 略高于汪译本的 4.30。在英语中, 6 字母以上的单词常认为是长难词, 平均词长越长, 长难词汇越多, 文本阅读难度相对就越大。因此,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两个译本中 6 字母以上词汇占比, 发现梅译本为 27.06%, 汪译本为 24.55%, 差异较为明显, 说明前者用的长难词较多, 进一步印证了其难度略大于汪文本。

平均句长是指一个文本中句子所包含词语数量的平均值, 据此参数也可了解文本的难易度。统计发现, 梅译本的平均句长为 17.40, 汪译本为 16.79, 均高于英语原创语料库 BNC(英国国家语料库) 的 15.62(Laviosa, 1998), 反映了“显化”这翻译共性特征。

词汇密度无法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自动获得, 需通过人工简单统计和计算得出, 其公式是: 词汇密度 = 实义词 / 词语总数 × 100%。英语中的实义词包括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词汇密度值越大, 说明该文本所使用的实义词越多, 其信息负载就越大, 文本难度相对越大。本研究发现《庄子》梅译本和汪译本词汇密度没有明显差别, 前者略低于后者, 但均略高于 BNC 的 54.95, 说明上述译本的信息负载量和文本难度均大于英语原创库。

易读性参数 Flesch Reading Ease 根据美国 Rudolf Flesch 博士的统计方法计算获得, 数值在 0 和 100 之间, 数值越大, 文章越容易读, 60—70 为标准阅读难度。本研究发现, 梅译本和汪译本的易读分数分别为 66.04 和 67.15, 亦表明前者较后者难度略大。

从上述语料库所呈现的形式类参数结果来看,《庄子》梅维恒译本整体难度明显大于汪译本,且两个译本难度大于英语原创文本,反映了翻译文本的共性特征——显化。

3.2 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

黄立波(2018)认为,体现译者风格的语言类参数主要包括外来词、文化特有项词、转述(报道)动词、连接词、代词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庄子》两译本文化特有项词的翻译策略。文化特有项词,也称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²³²。《庄子》是庄子本人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的凝结,其中包含了许多文化特有项词,下文分别探讨梅译本和汪译本中虚构人名及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

3.2.1 虚构人名的翻译策略

《庄子》一个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于通过寓言、重言、卮言等形式传递其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文中出现大量虚构人物,他们的名字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因此,翻译此类人名时,是采用音译转写还是阐释其深层含义?这是留给译者的一道选择难题。对此,梅维恒和汪榕培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例如: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德充符》)^①

Mair: Duke Ai of Lu inquired of Confucius, saying, “In the state of Wey there was an ugly man called Nag the Hump.” (“Symbols of Integrity Fulfilled”)

Wang: Duke Ai of Lu asked Confucius, “In the state of Wei there was an ugly man by the name of Aitai Tuo.” (“Signs of Complete Integrity”)

《庄子》中虚构了一系列“怪人”形象,这些人虽身有残疾,却有着迥乎常人的道德高度和人生智慧,如《德充符》中塑造的王骀、申屠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闔跋支离无脣、窶盎大癩,他们或跛脚伛背,或相貌奇丑,或脖上长瘤,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身体特征。例子中的哀骀它,陈鼓应(2016)¹⁸⁵注解为:“‘哀骀’,貌丑。‘它’,名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虚乌有之类。”此人虽然相貌丑陋,但却颇具个人魅力,男人跟他相处不舍离开,女人情愿做他的妾,甚至鲁哀公都请他做宰相。“正因为身体不完美的感知力会扭曲真理,所以,真理要求将追求知识转移到心灵上来。”(舒斯特曼,2011)⁷⁹在翻译这个虚构人物时,梅维恒将其归化为 Nag the Hump,译出了其名的字面含义,又老又丑且驼背,使读者听其名如见其面,从而达到原文想要传递的“形”与“德”的巨大反差,且尽量保留原文人名的文学创造特质;汪译本则采用音译,异化了一种声音符号,对译入语读

^① 例句中画线部分为笔者添加,下同。

者却缺乏必要的意义传递。

基于自建平行语料库,我们通过更多检索(如表 2 所示)发现,对于《庄子》中假托的虚构人物,梅译本整体倾向于意译,注重解释人名的深层含义,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汪译本则混合使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更偏爱后者,往往利用音译传播异质文化,为目標语读者造成陌生感。

表 2 《庄子》虚构人物梅译和汪译(部分)

虚构人物名	梅译	汪译
叔山无趾	Toeless Uncle Hill	Shushan the Toeless
闔跂支离无脰	Lipless Clubfoot Scattered	A man with club feet, hunchback and no lips
彘盎大癰	Jar Goiter	A man with a big tumour on his neck
伯昏无人	Uncle Obscure Nobody	Bohun Wuren
无为	Non-action	Wuwei
无始	Non-beginning	Wushi
昆阍	Dusky Gates	Kun Hun
鸿蒙	Vast Obscurity	Natural Energy
泰清	Exalted Purity	Taiqing
少知	Little Knowledge	Shaozhi

3.2.2 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

《庄子》中包含大量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术语,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正如许国璋(1983)所言,“哲学著作的翻译家肩上负有完整介绍一种哲学体系的责任。他的责任超过翻译:他还必须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一种概念系统。”译者对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不仅鲜明体现其文化倾向和翻译风格,且能在一定范围内立言立解。在庄子思想中,“天”和“道”是其核心范畴,“作为哲学本体内容的天论和道论形成了庄子‘并行的独特的形上学体系’(张敏,2009)。因此,本节着重探讨梅译本和汪译本中以“天”和“道”为代表的哲学术语的翻译策略,管窥其译者风格。

(1) 天。

“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冯友兰(2001)⁸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有五重含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庄子》全文中“天”共出现 668 次,其意义大致可分为五类:①天地万物,即自然界,经常与“地”“下”搭配出现,其他如“天倪”、“天钩”、“天籁”、“天府”、“天机”等亦含有自然之意。②自然,天然,没有经过人为干预的,即庄子所说的“无为为之之为天”(《天地》)。③事物的必然性,如“遁天倍情”(《养生主》)。此三者均为庄子对“天”的哲学理解。此外,该词在《庄子》中也有具体所指。④与“地”相对的“天”,如“天之苍苍,其正色邪?”(《逍遥游》)、“仰天而嘘”(《齐物论》)。⑤“天下”也可表示国家或王权。

通过语料库检索发现,《庄子》内篇中与“地”相对的“天”,即客观天空的概念,梅维恒和汪榕培均译为 *sky*;当“天”表示自然、天然时,两位译者也往往使用 *nature* 一词。然而,当“天”用以指代天地万物(尤其是“天下”),更多蕴含哲学意义时,两译本差异明显,梅译更倾向于使用 *heaven*,而汪译则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译为 *heaven* 或 *world* 等,如表 3 所示,《庄子》内篇梅译本使用的 *heaven* 远高于汪译本,而汪译本使用 *world* 一词的频率几乎是前者的近 7 倍。例如: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论》)

Mair: There is nothing under heaven larger than the tip of a downy hair at the end of autumn, but Mount T'ai is small. (“On the Equality of Things”)

Wang: There is in the world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tips of the downy hairs of a bird in autumn while Mount Tai is tiny. (“On the Uniformity of All Things”)

这句话旨在论证庄子关于事物大小、多少等概念的相对论,“不要局限在感官认识上去比较事物表面上的数量差别,而要通过抽象思维去认识一切空间的大小都是相对的。”(严北溟,1981)。其中的“天”与“下”搭配,意为自然万物,梅维恒常将其译为“(all) under heaven”,而汪榕培则往往选择“*in the world*”表示。*heaven* 一词具有西方基督教色彩,被美国译者采用对等中国哲学的“天下”易为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但中国译者汪榕培则更倾向于使用中性的 *world*。选词的差异表现了两位译者的文化视角和身份差异,同时也体现了其翻译策略倾向,前者偏爱归化,而后者则更偏爱异化策略。

表 3 《庄子》内篇梅译本和汪译本“天”的翻译

	heaven	world	Nature/natural/naturally	empire	throne	sky	others
梅译本	86	3	12	4	0	7	10
汪译本	53	20	14	4	2	10	19

(2)道。

“道”是中国道家思想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庄子》中的“道”与老子之“道”一脉相承,是其哲学本体,其含义复杂多变,可概括为四个层次:①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有时也被称为“大道”“至道”;②规律,方法;③道路;④言说。

1842 年,儒莲在其《道德经》法译本中将“道”译成 *way* 之后,“道”在西方语言中的译文变得多姿多彩(刘乾阳,2012)既有人将其译为带有宗教色彩的 *God*、*Spirit*、*way*、*the Way*、*the Providence*,也有将其译为 *Rule*、*Principle*、*Reason*、*Infinity*、*Nature*、*Existence*,还有人认为上述任何一词都无法完全传递“道”本身的复杂内涵,因而将其直接音译为“*Tao*”“*Dao*”或“*Tau*”。梅维恒的《庄子》译本沿袭了此前华兹生等西方译者普遍采用的方法,将“道”译为“*the Way*”,而汪榕培则一脉相承冯友兰和林语堂等中国译

者的译法,将其译为“Tao”。两个译本的实义高频词表中, the Way 和 Tao 均排在第四位(梅译 341 次,汪译 411 次),梅译本充分考虑读者视域,注重译本的接受性,汪译本则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异域读者,考量更多的是词义的准确性和文化的完整性。例如: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

Mair: The Way has attributes and evidence, but it has no action and no form. It may be transmitted but cannot be received. It may be apprehended but cannot be seen. (“The Great Ancestral Teacher”)

Wang: Tao is a reality which has its substance, inert and formless. it can be transmitted by the heart, but not taught by word of mouth; it can be acquired by the heart, but not seen by the eyes. (“The Most Venerable Teacher”)

《大宗师》中这段话往往被视为庄子之“道”的经典定义,详细描述了其特性。梅维恒将“道”译为“the Way”,虽然该译法为许多译者采用,字面意思也跟“道”类似,但二者的文化内涵却迥然不同。The Way 在译入语文化中与西方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圣经》中的 way 常特指“基督的启示与救赎之路”(刘乾阳,2016),而“道”却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概念,庄子的“道”侧重个人精神的内省洞察,它可以指引人生,却绝不是至上的人格神所揭示的解脱之路。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曾表示,“希望终有一天,当西方读者读到‘道’时,不再理解成‘the Way’”。(郭薇 等, 2020)与梅译不同,汪榕培将“道”译为 Tao,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种文化陌生感,反而能吸引其兴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因为 Taoism, Taoist 已经被西方世界广为接受,Tao 等相关词汇也已成为主流英文词典的一项词条。

4. 译者风格差异影响因素

通过上文对梅维恒和汪榕培《庄子》全译本中形式类参数的语料库分析及语言类参数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发现:梅译本所呈现的译者风格表现为语言使用难度更大,文笔灵活,注重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倾向于归化策略;汪译本则难度较小,文笔凝重,更注重源语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播,倾向于异化策略。

两位同时代译者几乎同一时期产出风格相异的《庄子》译本,其动因主要在于二者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及目标读者。

4. 1 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

译者的文本选择是译者风格构成的一部分。

作为美国知名汉学家,梅维恒翻译《庄子》主要是个人的主观选择,源于他对这部作

品的喜爱,“《庄子》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品……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是我最想译成英语的作品。”^①(Mair, 1994)^{vi}在其译本的前言部分,他也对《庄子》极尽溢美之词,“奇怪精彩”“诙谐有趣”“把《庄子》主要当作文学而非哲学作品”,视庄子为文学家和“player”。于梅维恒而言,每次阅读《庄子》都能让他快乐放松,故而想把此书与他人分享,希望他的译文能让读者免受原文深奥术语的影响,尽情享受阅读世上最诙谐、最有乐趣的作品(Mair, 1994)^{vi}。

在中国,《庄子》首先被视为一部哲学典籍,其次才是文学作品,汪榕培亦持此观点,“《庄子》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顺应自然的社会观和汪洋恣肆的文学语言而为世人瞩目。”(汪榕培,1995)在谈及翻译目的时,汪榕培认为之前都是英美人的全译本,原文理解和气文连贯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他将近期国内庄学的最新成果融入译文中,主动肩负起“让《庄子》以真实面貌从东方走向西方”(汪榕培,1999)⁴¹的重任。当然,汪榕培译《庄子》也有个人因素,“我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我自己的思想理念。”符合他对自己“本色译者”的定位。但同时,他翻译《庄子》也是一种官方行为,“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我接洽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事宜,我接受了《庄子》的翻译任务。”(汪榕培,1995)显然,汪译本具有国家和集体的选择因素在内,更多承担的是中国哲学思想对外传播的任务。

4. 2 翻译原则

由于梅维恒和汪榕培翻译《庄子》目的不同,分别注重传递原文的文学色彩和哲学思想,两译本的整体翻译原则也不尽相同。梅译本更加注重原文活泼灵活的文学风格,而汪译本则在保持译文流畅性及可读性的同时注重原文思想内涵的准确传递。

梅氏的整体翻译原则是尽量“贴近原文,避免意义模糊或译文蹩脚”,同时也“大胆采用新的表达方法模仿其古怪的写作手法”(Mair, 1994)^{vi},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他对原作文学风格的尊重和模仿。梅译本借用《庄子》名篇《逍遥游》的主旨作为整部译作的主标题——Wandering on the Way,创造了一种唯美的文学意境,副标题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则强调了《庄子》作为文学作品讲故事和寓言的一面。梅维恒译本对原文文学风格的忠实传递突出表现在以英文韵文翻译书中的诗歌部分,注重传递中国传统文学的诗性特质。例如: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

Mair: Great knowledge is expansive;

Small knowledge is cramped.

Great speech blazes brilliantly;

Small speech is mere garrulousness. (“On the Equality of Things”)

^① 梅维恒引文均为笔者翻译。

梅维恒采用韵文形式,简洁明了,富有文学气息,跟他一贯强调的《庄子》原文风格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完美契合。

汪榕培《庄子》“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的就尽量直译,也就是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汪榕培,1999)⁴¹。此外,如果译文“可能出现词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用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所以,当同一个概念或术语在不同的行文中出现,“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汪榕培,1999)⁴²,例如“无为”在不同情况下就被译成 non-action, do not take any action, do nothing 等,反映出译者对原文哲学思想的准确把握。

4. 3 目标读者

“翻译文本呈现模式与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的符合度,也是衡量翻译文本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王瑞 等,2015)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读者:不懂汉语但对中国文学好奇或喜爱的英语读者,懂汉语或正在学习汉语的英语读者,说英语的中国籍读者”(Eoyang,1993)⁶⁸。梅维恒和汪榕培在翻译《庄子》时也充分考虑其目标受众,均为欧阳桢所提到的第一类读者,即普通的英语读者,比如汪榕培就明确提出,其译本“读者对象为西方的一般读者”(班柏,2018)。但两个译本由于出版单位、发行范围及体例安排不尽相同,所以在副文本及翻译策略上也使用不同的手段以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期待。

《庄子》整体风格活泼幽默,但文中一些哲学术语的意义却充满了流动性,给翻译造成一定难度。在处理此类术语时,两位译者都摈弃了文内注解的方式,因为“正文中插入解释性文字或者作为脚注势必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朱舒然,2019)然而,梅译本由于主要受众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不甚了解的英语读者,其译文副文本信息内容和形式均远远多于汪译本,如前言详述庄子其人其书,附带古代中国地图,每章正文前增加译导语简介该章内容,文末详略不一、长达 38 页的术语表(包括人名、地名、术语典故)等。即便如此,许多注释由于篇幅问题无法在译本中呈现,梅氏在自己主编的 Sino-Platonic Papers 期刊开设一期专刊,撰文收录《庄子》全部注释内容,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阅。

相对而言,汪译本由于是原文、今译和英译对照,原文许多信息读者可以通过双语对比而增强其理解,故而其译本的副文本信息相对简单,主要是文末的“译名对照表”,共 21 页。此外,译者帮助读者理解的方法还包括在个别地方“加译了庄子的‘不言之言’和‘言下之意’”,以及在“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则采用了解释性的译法”,尽量减少明显的注释,因为这样“读者不必随时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汪榕培,1999)⁴²,“用译入语中的互文指涉,从而激活译文读者的知识、文化图式,以使读者产生深层共鸣,领略到《庄子》的艺术风采”。(马向辉 等,2008)

5. 结语

通过自建梅维恒和汪榕培《庄子》全译本的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我们主要从语料库形式类参数和语言类参数的翻译策略入手,考察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呈现。从形式类参数来看,梅译本的语言难度总体大于汪译本;两译本语言类参数的语料库统计发现,梅译本文笔自由,注重呈现原作的文学性,较多使用归化策略,而汪译本则文笔凝重,重在中国哲学思想的传递,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两个译本所呈现的译者风格的主要差异的主要动因为文本选择和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目标读者。此外,译本难度的差异也与译者的翻译方向,即译入和译出有关,王瑞和黄立波(2015)研究发现,“译入文本词汇丰富程度显著高于译出文本……译入文本比译出文本信息负载量更高”。

当然,欲更加深入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则需基于他们更多的翻译文本研究才能全面呈现,同时,《庄子》原文风格对译者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抛砖引玉,期待在这些方面未来有更多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班柏,2018. 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39(6):3-10.
- 包兆会,2004. 英语世界庄学研究回顾与反思[J]. 文艺理论研究(1):76-86.
- 陈鼓应,2016.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敏,2017.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五译本文化高频词翻译研究[J]. 外语教学,38(6):80-83.
- 冯庆华,2008. 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M].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 冯友兰,2001. 中国哲学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郭薇,辛红娟,2020. 哲人译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路径探析: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 外语与外语教学(5):139-147.
- 侯羽,郭玉莹,2021.《红楼梦》霍克思英译本翻译风格研讨:以语用标记语 I think 的使用为例[J]. 红楼梦学刊(2):190-211.
- 胡开宝,谢丽欣,2017.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内涵与路径[J]. 中国翻译,38(2):12-18.
- 黄立波,朱志瑜,2012. 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J]. 外语研究(5):64-71.
- 黄立波,2018. 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反思[J]. 外语教学,39(1):77-81.
- 姜莉,2014.《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舒斯特曼,2011.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 程相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79.
- 廖七一,2000. 当代西方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 林琳,周桂君,2021. 心智哲学视域下译者意向性的表征研究:以理雅各和汪榕培《庄子》英译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9(1):84-88.
- 刘乾阳,2012. 跨文化视角下《庄子》“道”的英译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 刘泽权,闫继苗,2010.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中报道动词及英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87-92.
- 马向辉,宫玉萍,2008. 互文策略与文化用心管窥:兼评《庄子》的两个英译本[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1-13.
- 仇轶凡,李秀英,2021. 功能语境视域下《庄子》实用成语英译探析——以汪榕培《庄子》为例[J]. 外国语文研究,7(1):102-112.
- 王克非,2012.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汪榕培,1995.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10.
- 汪榕培,1995.《庄子》十译本选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4):59-63.
- 汪榕培,1999. Zhuangzi[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许国璋,1983. 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 国外语言学(1):1-18.
- 王瑞,黄立波,2015. 贾平凹小说译入译出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 中国外语,12(4):97-105.
- 徐来,2008.《庄子》英译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严北溟,1981. 从道家思想演变看庄子哲学[J]. 社会科学战线(1):11-18.
- 殷燕,2021. 哲学家视野和致用型翻译:冯友兰英译《庄子》的副文本考察[J]. 中国翻译,42(1):120-130,191-192.
- 张敏,2009.《庄子》内篇“天”论思想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9):91-94.
- 张伟红,2020.《庄子》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途径与意义[J]. 外国语言与文化,4(4):125-132.
- 赵彦春,吴浩浩,2017. 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及译学思考[J]. 外语学刊(6):100-106.
- 朱舒然,2019. 论《庄子》的哲学翻译:以《齐物论》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51(1):96-108,160-161.
- 庄少霜,2016. 描写翻译学下《庄子》概念隐喻翻译对比研究[J].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5(3):111-114.
- ALLINSON, ROBERT E, 1989. 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 [C]//BAKER M, FRANCIS G, TOGNINI-BONELLI E.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33-250.
-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 translator[J]. Target (2): 241-266.
- MAIR, VICTOR H, 1983. 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IR, VICTOR H, 1994. Wandering on the Way[M]. New York: Bantam Books.
- BOSSEAU C, 200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voice and style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J]. CTIS Occasional Papers (1): 55-75.
- BOSSEAU C, 2006.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The Waves[J]. Meta (3): 599-610.
- EOYANG E C, 1993.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AVIOSA S, 1998. Core Patterns of Lexical Use in a Comparable Corpus of English Narrative Prose[J]. Meta, 43(4): 557-570.
- OLOHAN M, 2004.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 SALDANHA G, 2011. Style of translati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in translations by Margaret Jull Costa and Peter Bush[C]// A. Kruger, K. Wallmarch, J. Munday.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C]. London: Continuum: 20-35.
- SALDANHA G, 2011.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Translator (1): 25-50.

作者简介：

张伟红,女,1974年10月生,河南郑州人,郑州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典籍翻译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